
漂流物

孫梓評

漂流一年多，以為寄去的明信片突然出現。朋友不約而同拍下、傳來他們收到的明信片，一張是霧茫茫勝利紀念柱，一張是小綠人信號燈，我在風景前已透過手機傳過訊息說過的那些話，不知道為什麼還要用明信片寫一遍。

柏林兩週是變奏與遞減。從看似一切如常，到各種歇業模樣；從架上貨色充足，到一掃而空；從食物和服務生都充滿溫度的德式小館，到必須空出社交距離的麥當勞。離開前一日，搭車至哈克雪市場，連續遇上五間咖啡館停業，終於得以投靠的浮島，店內所有商品大減價，因隔天起也要閉店一個月了。拿酒精濕巾擦過雙手然後桌子，酪梨吐司搭配葉門咖啡，就埋頭寫起明信片。窗外是三月中旬最末日，已不很冷，空曠院子植有碩實木蓮樹，含苞指向天空，像一顆顆不打算發射的子彈。

寫完明信片，滿街找郵筒，幾日前還營業的商場都打烊了，博物館更早，所幸超市和少數餐廳還開著，終於找著兼賣郵票的鋪子，顧客遵守社交距離排間隔很長的隊，隔一扇透明壓克力，身形豐滿的店老闆不伸手拿貼好郵票的明信片，要求直接擱在櫃子上，稍晚取走。一整疊明信片，留在那兒，像託孤。

二〇二〇年三月上旬我搭兩趟飛機抵達柏林。出發前朋友寄來戰備物資：PVC薄手套，酒精棉片。行李裡尚有口罩數十，酒精噴霧，治流感中藥粉。夜間前往機場，計程車司機淡淡說：「現在還有人肯載，等你回來就沒人敢載囉。」我苦笑。高架橋兩側黑暗蒼鬱的林木擦窗而過。司機又說，等下到機場先吃飽，上飛機絕對不要拿下口罩。

機場空曠，服務人員站在自動通關閘門後頭發放餐廳折價券，零星有人用券買了食物，各自找座位吃。機上也空曠，前後左右都沒人，畢竟此刻歐陸疫情已點燃，誰還飛巴黎？降落前，廣播說，基於規定，必須為班機乘客消毒，於是空姐一臉肅穆，雙手握緊殺蟲劑般酒精噴罐，優雅地從我們頭頂沿途灑落。

是因為神經質，還是真的愈來愈多人喉嚨不適？轉機層的咖啡館，當我挑選了couscous沙拉，看上去很美味的可頌，熱咖啡，正打算享用我的戴高樂早餐，隔兩公尺處一位西裝男子似有呼吸道的困擾，他邊看報紙，邊不經意擤鼻、咳嗽。他可能跟我一

樣有過敏性鼻炎，我安慰自己，同時感覺胃部一陣緊張的回應。類似情境後來在柏林一再重演，車廂裡，月臺上，賣場中，看不見的漂流物在空氣中製造傳染，眼所能見，只有線條優美的流雲，枯了將春的老樹，枝桠上有團團纍纍的黑巢。

心很掙扎。抵柏林首日，當地確診人數是兩位；過幾天，變為九十。湖邊躲了四十八小時，看著悠哉划水的羽禽，覺得真要白來一趟嗎？決定戴上黑口罩進城，換來當地青少年的捉弄與訕笑。看見我們戴口罩，生鮮超市警衛且攔住說，戴口罩禁止入內喔！隨即又說，開玩笑的。不知道哪裡好笑。

到柏林圍牆，晴藍色自天空傾倒，整棟公寓側面畫有栩栩如生的肉，被誰的刀切割。突然的冰雨，彩虹，東邊畫廊灰牆上，一九七九年的蘇聯領導人還深深吻著一九七九年的東德領導人，塗鴉名稱也傳神：〈我的上帝，助我在這致命之愛中存活〉。啊，這也是Yony Leyser自導自演《柏林慾樂城》，那個半以色列半巴勒斯坦的美國作家強暴變裝的俄國難民同志男妓之處吧。

又躲了二十四小時，另日，去班雅明《柏林童年》寫過的勝利紀念柱，其後步行到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迷宮一樣起伏高低的碑，空氣隨將至的黃昏漸有一種冷冽。馬路對面，是遭納粹迫害同性戀者紀念碑，長方體清水模藏一處缺口，像囚籠外可以窺

見牢的內部，內置螢幕，重複播放同性別的親吻。

柏林確診人數已逾兩百。梅克爾預告將有七成德國人感染。川普禁止歐洲旅客到美國三十天。法國、荷蘭宣布封城。此行乃三年前決定的文化部與歌德學院合作駐村活動，早餐後我們決定主動發信詢問駐德人員，對方開會後，回覆將取消本來安排於三月底的講座，接著，就是購買機票大作戰。

疫情趨緊，連日數變，飛巴黎、倫敦的班機訂好後陸續被取消。我的兩段式機票左支右絀，只好高價另購歐陸段機票，為了接駁能回臺灣的長途班機，最終決定從柏林搭機往阿姆斯特丹。遠在臺灣幫忙訂票的旅行社朋友建議我搭最早一班，臨時有狀況，還能改乘火車。

這一趟，我寄住 Literary Colloquium Berlin。除了三位同樣來自臺灣的寫作者，臨靠湖邊的古老建築中，訪客還包括其他國家的翻譯者。LCB員工也在同一棟建築內有許多辦公空間。大宅一樓設廚房和能燒熱水的壺，我去裝水，遇見相識的奧古斯都，他說很遺憾這裡即將關閉。其實，其他國家的譯者早在幾天前全數消失。他問我臺灣狀況可好？我說大家出門願意戴口罩，他說他也想戴，但買不到。我想起前兩天在藥局，收銀櫃臺已掛上大片透明塑膠軟布，店裡售有很多觀光客愛買的薄荷油，沒有口罩。

人也似漂流物，我終於順利把自己又運到泰格爾機場。地勤人員盯著我說了三次：「抵達阿姆斯特丹，你只被允許待在機場。」句子後半聽起來很村上春樹。轉機時間有十個小時，已做好和史基浦機場深交的心理準備，但當望見「歡迎來到海平面以下」看板，事情仍超乎我的想像。本來大排長龍、購買通往市區車票的區域不見人蹤，陽光篩過立柱成為漂亮的長影子。除藥妝店、超市，五分之四店家都歇業了。外觀時髦的三明治店，擱淺門口廊道上給客人使用的桌椅皆已蒙塵。我用酒精濕巾擦過，拿出提袋中在超市仔細挑選的食物，脫下口罩，開始我的野餐。

這是一個危險的時分，食物和我，忽然赤裸；而往來之人，超過一半沒戴口罩。離班機起飛時間實在太久，我慢慢吃完壽司，又慢慢吃完無花果，再慢慢打開我的啤酒，一位嬉哈裝扮的男士走向我——正確地說，是走向我身旁的空位。被隱約隔成三格的長凳，我使用了三分之一，其他空位，理所當然應該由其他人使用。我忘了臉上微笑有沒有變僵。辮子頭男士沒戴口罩，單耳聽著耳機，表情木然。我默默喝完最後一口酒，假裝不經意戴回了口罩。

整座機場像是睡了，穿越一整排打烊的免稅店，班機終於順利起飛（地勤人員為我們每一位量過體溫），前後左右、間隔七排座位僅我一人，降落時間較預定早，通關順

暢，防疫計程車一路載我回到獨居公寓。非常幸運，朋友與家人準備許多物資供我度過兩週隔離與一週自主健康管理。必要時，社區管理員將包裹放在門口讓我自取。

隔離期間，我寫簡單日記，記錄體溫，飲食，身體狀況。喉嚨有點發癢時，回想幾日前的柏林移動，是否哪個環節疏忽了？缺乏運動的身體感覺痠痛時，憶起阿姆斯特丹機場野餐，當我坐在走廊中間，會不會剛好有路過的誰，將病毒準確送進我的嘴巴？愈來愈多新聞報導無症狀或輕症確診者，一邊晾曬衣服時一邊嗅聞自己，我也是無症狀的病人嗎？如此惴惴揣測，完成隔離，重返職場。如同多數臺灣人，進出各處戴上口罩，加倍留意洗手，隨身攜帶酒精，相較世界各地陸續的災情，我們可以進出餐廳，理髮，百貨購物，看許多表演，數百個日子，倚賴許多人付出而有優異的防守，甚至能輕快展開島內小旅行。

望著朋友拍下的明信片，稍顯陌生的、一年多前的字跡，以及其實託給郵票鋪子隔天就已蓋上的郵戳——這一年多，明信片變成魯賓遜嗎？去了哪裡？我在手機上放大讀取柏林寄回的明信片，渾然不知，再幾天，臺北就將升級為三級警戒。遲了一年多，病毒還是漂來了，屬於我們的戰爭，才正要開始。

寂靜中的聲音

何曼莊

1. 亞洲問題、美國問題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徒步來到布魯克林一間小畫廊外，排隊等著入場聽Louie Anderson 演奏會的隊伍占據了人行道，我的好友K跟D已經占好了位置，我把用塑膠袋包好的口罩塞在他們口袋裡，一人一個，他們只是問我在臺灣的家人還安全嗎？並沒有打算戴上，我知道有些人打從心裡相信新冠疫情只是一個亞洲問題，但沒關係，如果疫情真的不來美國，我也欣然接受。

Louie Anderson 上年紀後，一年只開一、兩場演唱會，其實我從來也不怎麼喜歡她的風格，跟來現場只是因為她非常有名，想表示我也是個懂前衛音樂的人，但坐下來